

# 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姚枝仲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把着力点放在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水平开放上,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 在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中增强国内循环内生动力

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对于形成内生发展动能、掌握发展主动权意义重大。国内大循环的动力既来自于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也来自于供给对需求的创造,更来自于供需之间的良性循环。为此需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在更高水平上形成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

持续扩大国内需求要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和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使经济增长的好处能够惠及更广泛人群,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还要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获得感,增强消费意愿。完善扩大投资机制,要不断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持续突破供给约束,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满足人们不断升级的需求;另一方

面,要持续推动创新发展,特别是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创造引领新的需求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畅通供需之间的循环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要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完善硬件和软件、渠道和平台,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持续推进金融改革,发挥金融融通和流转在畅通供需循环中的联通作用。

## 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中提升国内循环可靠性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要增强危机意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此,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基础性支撑。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加强科技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

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从事研究开发、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良好环境和服务保障,让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国效力。

## 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增强国内外循环活力和安全性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国民经济各产业有机链接、高效畅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和安全性、增强国内大循环发展活力和对国际大循环带动能力的基础。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提升产业竞争力。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 在增强国际话语权中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有利于不断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此,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程度,并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建设更加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程度。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增长点。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探索并推广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稳固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的经贸合作关系。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使中国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推动全球化不断前进,推动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

建设质量强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转变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把对质量工作的重视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质量已经成为时代命题和时代呼唤,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加快提升质量竞争力,以质量强国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质量是繁荣国际贸易、促进产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要素,是一个多维概念,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在微观层面,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强调产品、工程、服务的特性满足标准规范和市场需求的程度。微观层面的质量通常由企业等微观主体以质量标准、质量数据、质量管理等方式进行控制,具有可量化、可评价、可追溯的特点。在中观层面,质量主要是指产业、区域、生态等质量,是微观质量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结果。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正在进一步转型升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加速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全局性变化,中观层面的质量发展优势正在逐步体现。在宏观层面,质量代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体现了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等高质量发展方式。宏观层面的质量是推动全社会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质量,是包括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在内的一种综合竞争力。

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全方位推动质量强国建设,提升质量竞争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质量支撑。

**提升质量竞争力,要发挥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作用。**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支撑,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多年来维持在93%左右的较高水平,质量竞争力持续跃升。但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不足。需要强化产业基础质量支撑,提升基础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的可靠性、适用性、耐久性、先进性,提高生产制造的敏捷度和精益性,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进程。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配合和协同创新,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现代农作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质量提升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以质量为抓手引领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升质量竞争力,要发挥其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助推器作用。**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产业质量竞争力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要依托种养业、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等,拓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特色小镇经济;持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遇,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让乡村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要以质量为抓手,统筹布局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资源,畅通经济循环,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以质量为牵引,激活城乡要素流动,引导区域合理分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提升质量竞争力,要发挥其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保障作用。**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迫在眉睫。我国产业链整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端,大而不强、宽而不深,产业链脆弱性明显,质量和品牌美誉度有待提升。质量是国际通行的产品名片,标准是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要加强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国内国际衔接,推进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积极参与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关规则和标准制定,推进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深入开展双多双边质量合作交流,加强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有关国家的质量对话与磋商,加快提升质量竞争力,全方位推动质量强国建设。

(作者系中国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

#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要把握三个逻辑

杨长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回望历史,从改革开放后的融入世界经济,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再到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我国对外开放理论逻辑与实践与时俱进、逐步深入的体现。新形势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需紧紧围绕畅通循环这个关键,瞄准提升质量和水平这个目标,把握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 理论逻辑:把握两个对立统一关系

经济循环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有机衔接和周而复始,是实物循环与资本循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国际循环是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循环越出一国的产物,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链条在世界范围的延伸,本质上仍包含这两个对立统一关系。从生产力看,国际循环是否畅通,直接表现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否繁荣,直接决定了全球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能否有效积累,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变量。从生产关系看,各经济体在国际循环中的分工地位明显不同,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从国际循环产生的增值与财富中获益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上层建筑看,国际循环伴随着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的构建,如国际贸易体制、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各类区域经贸协定等。这意味着,我国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关

系、上层建筑等层面一体推动。

## 历史逻辑:发展阶段变化提出新要求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这是对我国当前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客观、理性、精准判断。

从国内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高质量国际循环助力解决新矛盾新问题。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我国引入境外资本、技术与充裕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助力解决了供给短缺这个主要问题。进入本世纪后,我国加入WTO,国内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通过调整国际贸易与投资结构,拓展了参与国际循环的广度和深度,助力解决了大宗商品供给约束和多个行业需求约束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大大提升了国际循环优势,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要看到的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表现在供给存在卡点、堵点、脆弱点,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同时,国际环境明显趋紧,外部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在此形势下,一方面要求提升高质量引进来,以国内大循环吸引集聚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资源,改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要求推动高水平走出去,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对冲外部打压遏制的影响,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要求我国通过高质量国际循环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以

及“冷战”结束以来的快速发展演化阶段,进入模式转换和动力转型期。从生产力看,全球市场需求萎靡,传统贸易投资不振,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从生产关系看,不同国家、不同群体获益不均的矛盾充分暴露,成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矛盾诱因。从上层建筑看,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亟待调整完善。在此形势下,我国作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国,要通过高水平开放构建高质量国际循环,着力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着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合作共赢,着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 实践逻辑:找准提升质量水平的方向

我国已深度融入国际循环,但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效益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就是要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经济更为密切、更高质量的交流和互动。

从比较优势看,过去以要素成本为主,未来要向强大国内市场为主转变。这是从生产力层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根本。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大需求市场。关键是要推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迈上新台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在目前4亿多人基础上明显扩大,打造充满活力的消费环境,形成对全球优质商品、服务以及市场导向型优质外资的引力场。二是强大供给市场。关键是要在保持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的同时,依靠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世

界一流的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和服务体系,巩固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贸易投资新优势。

从规则基础看,过去以融入国际经贸规则为主,未来要向对标进而引领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转变。这是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层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方向。一方面,顺应国际经贸规则由“边境上”迈向“边境后”的趋势,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用好共建“一带一路”的丰富经验,在设施联通、陆上贸易、电子商务、能力建设、共享发展等领域探索引领相关国际规则演进,更加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着力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从衡量标准看,过去以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指标为主,未来要向是不是更好统筹国内国际循环转变。过去衡量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情况,往往使用对外贸易增速、利用外资规模、对外投资规模等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些指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衡量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整体情况,要将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统筹起来考虑。例如,不仅要关注外贸本身的增速,还要关注外贸是否带动了国内产业升级,关注内外贸一体化水平;不仅要关注利用外资本身的规模,还要关注外资是否带动了供给结构改善;等等。必须将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一体推进,在衡量标准方面体现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强动力。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推动企业成为基础研究重要主体

陈 志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注重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推动企业加强基础研究,要重点支持企业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向创新链前端攀升,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协同推动科技进步的巨大潜力,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动能。

在从事基础研究的各类主体中,企业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将科学发现的信号和市场信号叠加,找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前进的方向,将科技资源和市场资源结合,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大的力度将科学发现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企业能从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中找准科学问题,协同高校和院所提出并解决“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问题。拥有一批基础研究能力突出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先发优势的企业,已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作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参与者,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前进到科技前沿和“无人区”领域,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功能范围逐步扩大,但与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基础研究短板日益明显。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当然,企业加强基础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必须遵循基本科学规律,从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现实基础出发。我们不能忽视企业作为经济主体逐利的根本属性,它天然以应用为导向,更多关注创新链后端,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在企业研发经费中只会占到相对较小的比例。国际上主要创新型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一半以上也都投向了试验发

展,而非产生新知识的科学研究。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不仅基础研究投入较低,应用研究占比也不高,科学研究所需资源不足,特别是缺少一批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大师。现阶段我们更应强调推动企业参与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点是激励更多企业从单纯关注试验发展向爱迪生象限(应用研究)、巴斯德象限(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跃升。

考虑到基础研究本身具有较大风险和较强外部性,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要发挥好政府作用,重点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中央和地方采取多种方式对企业基础研究进行直接支持,特别是针对有市场前景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可探索“政府+企业”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引导企业进行前瞻性部署。同时,要不断完善企业基础研究税收制度,适时提高优惠力度,加强相关企业基础研究的激励与考核,从源头激发企业开展科学研究的内生动力。

总体上看,科学研究范式已发生深刻变化,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要注重推动各主体、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中,要善用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健全基础研究项目形成机制,在重大任务组织实施中完善创新联合体机制,探索“企业出题、共同解题、企业验收”等新型组织模式,使科技领军企业真正成为“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要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支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推进高校企业协同,根据企业需要培养合格的研究型人才;推进高等院校研究人员职称、聘用制度改革,探索企业基础研究研究人员职称评定办法,促进基础研究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合理顺畅流动。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